

元朝时期山西地区的史学成就

瞿大风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元朝时期, 山西地区的一些文人儒士具有明确而又强烈的史学意识。这些文人儒士在进行文学创作或从政活动的过程中, 不忘以述史传世为己任, 采取不同的创作方式记载史事, 其中, 有的以文录史, 有的以碑载史, 有的以诗存史, 有的以剧传史。他们的创作不仅实现了史实有载、后世有征的宗旨与目的, 而且还开创了传史警世、垂荐后人的特殊范例。他们的创作成就具有不可估量的宝贵价值, 至今仍为蒙元史学的研究提供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 元代; 山西地区; 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一)

元初之际, 面对“四十年来无史笔, 有年今日仗谁书”^[1]的史学衰败社会现实, 山西地区的一些文人儒士始以“但恨十年后, 时事无人知”^[2]感慨之情, 千方百计地搜集亡金逸事, 以文记录亲身见闻, 极力保存金元时期的大量史料, 为后代修撰正史、方志做出突出贡献。

在这些文人儒士中, 首当推举的著名人物就是金元之际的伟大文学家与杰出史学家——元好问。金灭亡后, 朝中记载随之湮没, 宫廷往事亦渐淡忘。为此, 元好问极力设法搜访史料以存故实, 一当获知金朝《实录》存放在顺天万户张柔家中, 便曾“言于张公, 使之闻奏, 愿为撰述”。虽然此举经人阻滞未能施行, 但是, 元好问并不善罢甘休, 认为“国亡史作, 己所当任”, “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依照这种作史宗旨, 他在家中特意构建“野史亭”, 著书述史, “采摭所闻, 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 乃至“捆束委积, 塞屋数楹”。^[3]他先后撰成《南冠录》、《壬辰杂编》、《金源君臣言行录》和《续夷坚志》等重要著作。

《南冠录》记其先世以及本人行年、事迹, 附有先朝杂事。^[4]《壬辰杂编》是金亡前夕史事见闻的一部杂稿。这部杂稿在元朝编撰《金史》的过程中, 以第一手资料产生过独特的参考作用, 后于清代嘉庆年间佚失。^[5]《金源君臣言行录》记载金源君臣的遗言往事, 所述多至百万余言。《续夷坚志》则是一部史料性的短篇志怪小说, 所载奇闻逸事涉及天文、地理、文物、艺术与医学等各科领域, 对于有关学科的专门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此外, 为了便于童蒙学习历史知识, 元好问“驰骋上下数千载之间, 综理繁会数百万言之内, 骈以四言, 叶以音韵”, “立片言而得要者”, 著成《帝王镜略》一书, 以使“世数代谢, 如指诸掌”。^[6]在艺术方面, 他曾编过一部名为《故物谱》的专门著作。^[7]元好问还注意保存科技成果, 亲手笔录《如积释锁细草》一书, 记有金元之际河北、山西一带出现的天元术, 即一元代数学, 以使“后人始知有天元”。^[8]

元好问具有高度的史学责任感、认真的撰写态度与严肃的批判精神, 这是最为令人称道的。元好问在“国史经丧乱, 天幸有所归”的历史条件下, 秉笔直书, 以“一语不敢私”, “文章得失寸心知”的严肃态度, 实事求是地记述亲身所历见闻, 信而有征, 且又述事夹议, 终使“百年遗稿天留在”。事实上, 元好问在“周流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的三十年中, 除了扩大河汾文学流派的影响以外, 另一目的就是欲以保存金源国史为己任, 搜集撰写各种史事, “惟恐其不能尽”。^[9]

因此，明代学者储巏所作“纲罗放失，辄访耆旧，孜孜矻矻，几三十年”的客观评论，应是对他广收博揽，不懈努力的最好诠释。对于元好问历尽艰辛、做史自任的史学贡献，清代学者凌廷堪以诗做过绝好概括，诗中赞云：“神京喋血竟生还，忍死重过石岭关。一寸秋豪成《野史》，百年老泪灑空山。身经北渡流离际，才与东坡伯仲间。文献中州尽凋丧，赖君大手记完颜。”^[10]

刘祁非常重视以文录史，曾经采用笔记体裁撰写过一部《归潜志》，详细记述亲身见闻。在自序中，刘祁明确指出著述宗旨在于“念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今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以便“异时作史，亦或有取”。^[11]以此观之，刘祁与元好问的著述宗旨与史学责任感大致相同，连其叙说录史的因果关系均如出一辙。

《归潜志》第一至六卷先作金末诸人小传；第七至十卷记录杂记遗事；第十一卷题为《录大梁事》，述及金哀宗亡国始末；第十二卷题为《录崔立碑事》，专门记述崔立作乱，廷臣撰文立碑之事。还有一篇《辨亡》，深入论说金初治平，末造亡乱，进而精辟论述历史教训。在录史内容上，刘祁的写作态度甚为严谨，不仅均以当时亲身经历与耳闻目睹的诸人诸事作为原始资料，而且严加取舍，“所传不真及不见不闻者，皆不敢录”。^[12]因而真实可靠，弥足珍贵。《金史》编者评价刘祁的《归潜志》与元好问的《壬辰杂编》之时，认为两部记实著作“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征”。^[1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评论为“谈金源遗事者，以此志与元好问《壬辰杂编》为最。”因而可以作为依据证补史籍之中的遗阙错误。

除了《归潜志》以外，刘祁还亲手笔录过一部《北使记》。金兴定四年（1220），礼部侍郎吾古孙仲端奉诏出使，谒见西征之中的成吉思汗。一年以后东行归来，因其“身使万里，亘天之西，其所游历甚异，喜事者不可不知”，乃托刘祁笔录成书，题名《北使记》。刘祁所录此记的宗旨同样十分明确，即“备它日史官采云”。^[14]《北使记》所录中亚地区风土人情与西辽史事罕见于世，遂使史料价值备受近代国际史学界的重视，被十九世纪的俄国学者译成英文，载入其所编著的《中世纪研究》之中。

陈庾著有《经史要论》、《三代治本》与《唐编年》。^[15]王迓，平阳人，隐居安邑，“博通经史，尤精通于易、春秋”，曾经著述《周四王年谱》流传于世。^[16]

这一时期，山西地区还有一些文人儒士在仕进任官中，或是载录游记，或是自撰史著，或是编写方志。其中，有的作品除与上述著作一样受到国内史家的特别重视，并且具有很大的国际影响。

刘郁，字文季，号归愚，为刘祁之胞弟。刘郁“亦名士”，“能文辞，工诗翰”。^[17]元初之际，刘郁累官监察御史，然而，他与刘祁一样留意于以文录史，亲手载录过一部名为《西使记》的游历行记。这部游记原是元宪宗九年（1259）彰德转运使常德旅行波斯，觐见旭烈兀往返途中的所见所闻，是研究古西域史和中西交通史的必读文献。这部游记的史料价值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与格外重视，且在十九世纪两次被法国学者译成法文，载入《马可波罗游记导言》（1865）。前述俄国学者将其译成英文，与《北使记》一并载入《中世纪研究》之中。

郝经被软禁在南宋期间，亦以“寄言后世”的撰史意识，以文录史，纂修《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陵川集》、《原古录》、《通鉴书法》等史籍和著作，^[18]数量约达百卷之多。今除《续后汉书》与《陵川集》尚存以外，其余均已亡佚失传。《续后汉书》是他所纂修的一部“三国志新编”，后于延祐五年（1318）正式刊印之际以其尊汉抑魏的正统史观改名《续后汉书》。此书在明代中叶佚失，后经清代乾隆年间修撰《四库全书》的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佚整理而出。《陵川集》则是一部文史价值很高的重要文集，是研究金元之际军事、政治、经济、思想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基本史料来源之一。

郝天挺是山西地区汉人世侯郝和尚拔都之子，一度受业于元好问，重史尚文。元世祖在云南建立行省期间，郝天挺受命担任参议云南行尚书省事、参知政事。他在从政期间，以身临其境的真切感

受，“尝修《云南实录》”，记载有关云南地区的各种史事，昭示后人。^[19]吕思诚虽然身任国子监丞，却以“不惟有以见其志之所存，亦将使夫士之微而在下者，得有以考其致用于他日”的编撰宗旨，汇编《省部政典举要》一书。^[20]吕思诚还自撰过个人文集与《两汉通纪》各若干卷。赵承禧任职御史台期间，依据至元五年（1268）到后至元元年（1335）之间御史台的档案资料，编有一部《宪台通纪》记载元代社会生活的多种史实。^[21]张翥则为“兵兴以来死节死事之人”作记立传，汇集成为《忠义录》一书。^[22]

这一时期，有些来自山西地区的文人儒士不仅建议纂修国史，而且还在宫廷纂修国史的过程中，亲身参与编修或总裁国史。徐毅被忽必烈擢为监察御史以后，就提出过“修国史以存故实”的建议。^[23]中统二年（1261），雷膺担任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24]皇庆元年（1312），平章政事李孟曾任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延祐元年（1314）二月，元仁宗诏中书省以宋超为翰林侍读、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25]泰定年间，王守诚以进士及第迁转艺林库使，起初参与撰著《经世大典》，担任礼部尚书之后，又参与过编修辽、金、宋三史。^[26]贺据德，以科举登第三甲进士，封授翰林国史院编修。^[27]吕思诚担任治书侍御史以后，先行“总裁辽、金、宋三史”，后又奉诏“总裁后妃、功臣传”。^[22]宋景祁入为国史院编修官。至顺三年（1332），王沂登第进士之后，一度担任国史院编修官。^[28]许寅，字可宾，科举会试第三十五名，后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29]郝忠恕担任翰林侍制之际，因献所著《无逸图》，“帝悦命总裁宋、辽、金三史”。^[30]在修辽、金、宋三史之中，元廷曾经诏命贾鲁担任《宋史》局官。至正初年，张翥在元廷修撰辽、金、宋三史期间，亦担任过翰林国史院编修官。^[31]

即使身处异地佛门之中，亦有潜心编撰史著之辈。史志经离开山西地区主持陕西西岳云台观期间，以“华山名岳，灵迹甚多，兵戈相寻，至于湮没，乃搜奇访异，亲历见闻，至古今名士所作碑记、表传、诗文，极力求之，期于必得”，著成《华山志》一书。这部方志内容详尽，编撰精到，被人誉为“纤悉备具，尤为尽心，在他人不可及”。^[32]

（二）

有元一代，这些文人儒士在以文录史的同时，还尽力通过以碑载史的特殊范例，将故闻史实付诸金石，以求传之永久不失。其中，元好问的这种意识最为明确，成就最大，堪称是以碑存史的出色典范。

大蒙古国时期，元好问常与北方各地汉人世侯结交往来，且为他们及其家人题写过不少的碑志铭文。元好问文采出众，行文著述“有例有法，有宗有趣”，以“铭天下功德者”，^[33]巍然“为一代宗工”，遂使“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34]因此，元好问抓住撰写碑记的各种机会，竭力保存故闻史实，以使所撰碑文成为当时的一种特殊载史方式。元好问毫不掩饰地说过：“史笔散亡，故老垂尽，不著金石以示永久，后世谈废兴，论成败，殆将有秦无人之叹”。^[35]他的《王公神道碑铭》重申：“今史册散逸，既无以传信，名卿託鉅公立功立事之迹，不随世磨灭者，繫金石是赖”。在《顺安县令赵公墓碑》中，他不厌其烦地再次提到，“记述国来公卿贤大夫言行，以传不朽，不胜区区之情，敢以墓碑为託”。^[36]为此，他在撰写碑记之中，采用巧妙的记述方式，再现金元之际的朝代更迭、人物事迹、社会活动与时代特征，且在传统碑记的基础上强调以碑存史的特殊方式。元好问所撰碑文通常较为真实可信，脉络清晰，叙中夹议，论述中肯，往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37]

元好问去世以后，所撰写的许多序引题跋、记、疏、书、杂体、表志、碑铭等遗稿被人收录编成文集刊行。虽然他的序引题跋与记、疏、书、杂体、表志等篇章存有金元时期各个社会领域的有关情况。但是，他的碑铭则更为详细地涉及到金元之际达官显贵或硕儒名流的出身家世及其各种活动。没

有这些碑铭则很难以详细了解与深入查考这一时期的事件始末、人物活动及其政局发展。《金史》和《元史》的一些列传就是经过详细查考这些碑志铭文撰写而成的。

这一时期，山西各地还有其他一些文人儒士擅长撰写碑铭，借以记事传史。在这些文人儒士中，李俊民撰写过一些碑记文章记述史实，内容涉及到山西地区的历史、文化与教育等各个领域。其中，《泽州图记》就是一篇较为重要的方志文献，文中载有泽州及其属县的地理沿革，间或记述历史大事。其中，有关“贞祐甲戌（1214）二月初一丙申，郡城失守，虐焰燎空，雉堞毁圯，室庐扫地，市井成墟，千里萧条，阒其无人”的生动记载，可使人们充分认识蒙金之间的血腥战争对于泽州造成的严重破坏。此文在明成化年间的《山西通志》或《庄靖集》中均可见到，是后人研究这一时期泽州史地变迁、战争恶果与人口状况的重要史料。其间，段成己亦撰写过一些有关军政人物、创建儒学与道教建观的碑文传世，不仅史笔查考有征，而且“文在班、马之间”。^[38]清末缪荃孙从《函宋楼藏书志》、《金文最》与《山右石刻史料丛编》中辑出数篇，编成《二妙集遗文》，收入《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之中。吕思诚常遇请托，撰写有关兴修庙学、佛寺与道观等各类碑记。这些碑铭均散见于《山右石刻史料丛编》与明代所修《山西通志》之中，除了作为后世撰写地方史志的有益史料以外，还是研究河东山西有关史实的可靠论据。

山西地区的方志之中还记载有一些博学能文的撰碑高手。其中，任斗南，武乡人，贡生侍郎，“博能有重名，邑中碑板多出其手”。^[39]王国宾，榆社人。元成宗时，出任翰林学士，“有著作才，文不加点，一时碑记多出其手”。^[40]靳荣，曲沃人，为河东山西汉人世侯靳和的重孙，以进士及第出任监察御史，后转奎章阁学士。靳荣博学能文，“曲沃之碑多出其手，而为志乘所艳称”。^[41]然而，他们的碑记铭文很少传世，难窥其貌。

（三）

金元之际，“百十年间，中州板荡，人物凋谢，文章不概见于世”。不少文人儒士“姑因录诗，传其人之梗概”，^[42]力图实现以诗存史的目的。就此而言，元好问深知“百余年以来，诗人多为，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但是，由于“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摅萃之，则将遂湮灭而无闻”。^[43]为此，元好问竭心尽力、矢志不渝地搜罗检括金代文人儒士的大量诗篇，编撰金代诗人的文学总集，同时，还不断地创作出为数众多的各类诗篇，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

元好问辑录而成的《中州集》及其所附金代乐府作品《中州乐府》中囊括有金代二百多名作家（包括少数宋人）的诗词作品两千多首。其间，元好问担忧百年以来的许多诗人及其作品湮灭无闻，从而在使“人各有传，其颠叙其行业仕隐”的同时，^[44]亲笔加以指点评论，间有一传附见数人事迹，甚至评说某些历史事件，“借诗以存史”，^[45]设法保留金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的发展概貌及其成就。《中州集》首开以诗存史的著述方式，进一步强化了诗歌的载史功用，称得上是一部别出心裁的开创性史学著作。这部诗集在补充、校勘《金史》之中产生过特别有益的作用，且与《壬辰杂编》等著作一起为元朝撰修《金史》提供过丰富、可靠的有关资料，^[46]遂使《金史》在“多本其所著”的基础上，成为这一时期所撰三史之中“独为完善”的一部史著。^[47]《中州集》不仅广泛流传于国内，而且还散佚到海外，^[48]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迄今仍是国内外研究金代史实与文学发展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元好问本人创作的诗歌总数则高达五千多首，相当浩繁，不过，现存仅有一千三百多首，大多保存在《遗山文集》之中。在这些诗歌中，元好问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创作出谴责战争恶果，指斥政治腐败，关心人民疾苦，反映社会面貌的不少作品。这些作品可谓是一部反映金元之际社会生活的不朽“诗史”。对此，清代学者赵翼颂诗论云：“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无官未害餐

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49]

房祺，平阳人，自号横汾隐者，历官河中、大同两府教授，终以潞州判官致仕，著有《横汾集》。大德五年（1301），房祺编成一部名为《河汾诸老诗集》的重要诗集。这部诗集涉及金元之际山西地区八位知名诗人的主要作品，内容反映出金元之际河东山西的社会背景及其鲜明特征。这些创作虽然不像元好问的诗作那样在更大程度上展现出当时社会的朝代兴替、丧乱动荡与时代风貌，却在一定范围上真实生动地再现出山西地区文人儒士的患难遭遇、日常生活、所见所闻与切实感受。[50]

段辅，稷山人，金元之际知名文人段克己之孙。初任应奉翰林，历西台、南台、中台三御史，金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事，入国子司业、太常礼仪院判官。[51]泰定年间，段辅“手自纪录”先人段克己、段成己所创作的“古诗乐府三数百篇”，且又“谨用录梓”，辑成一部《二妙集》，目的在于为使后代“子孙毋忘先业”。[52]这部诗集的内容涉及咏物述怀、吊古伤今、唱和寄赠、祝寿悼亡等诸多题材，可与元好问的诗作与《河汾诸老诗集》起到相互补充，彼此印证的重要作用，有助于从较为深入的不同层面进一步认识金元之际山西地区文人儒士的现实生活、思想感情、社会交往与复杂心态。

（四）

根据有关专家统计，元杂剧中流传下来的历史剧目现有四十余种，约占现存杂剧数量的四分之一。[53]其中，山西地区的剧作家所创作的历史剧目占有很大比例，内容上溯商、周，下至唐、宋，多是通过描述功臣名将、志士仁人的悲壮遭遇，颂扬英雄人物的宏伟抱负与铮铮铁骨，同时对于统治阶级的自私残暴与昏庸腐朽加以深刻的揭露批判。通常，元杂剧中的历史剧目都是依照剧作家的思想感情与心理活动大胆虚构而成，并不完全忠实于历史记载。但是，河东山西的剧作家所创作的历史剧目则具有忠于史实，隐喻现实、垂荐警世与寄托民心的明显特征。这些剧作家主要有白朴、李寿卿、狄厚君与郑光祖等人。

白朴是以剧传史的作家楷模，他的杂剧《梧桐雨》“沈雄悲壮，为元曲冠冕”，[54]一向获得世间盛赞。然而，对于《梧桐雨》的主题倾向，学界历来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剧情着重于同情和颂扬，有人认为意在批判和讽喻，还有人认为此剧在歌颂与批判之间显得混乱不清而又自相矛盾。事实上，白朴在借史舒怀，大胆虚构的杂剧创作中，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客观态度，以忠于史实的笔触再现出唐明皇李隆基的昏庸失政及其与杨贵妃的感情纠葛。白朴忠于史实的创作倾向饱含着自身特有的思想感情，又与自身遭逢世乱，生死离别密切相关。由此，他对史事的认识已经摆脱一概褒扬或一概贬抑的创作白巢，而是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客观态度取材于史料，且以杂剧创作形式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通观《梧桐雨》全剧，可以看出白朴依照对史实的独特理解与客观判断，合乎逻辑地展开铺述，进而表现出对其所处时代的世变沧桑，盛衰无常而油然而生“泪湿胡笳”的痛楚感悟。[55]《梧桐雨》除了作为元杂剧中首屈一指，名副其实的历史剧目以外，还应看作是依据史实进行创作的不朽杰作。

李寿卿笔下的《伍员吹箫》重新塑造出春秋时期的英雄人物伍子胥在父兄被害以后，投吴借兵，讨伐楚国，历尽艰辛，终于在十八年后报仇血恨的非凡壮举。李寿卿在歌颂这一壮举的开首，便借助伍子胥“兴学校，劝农桑，清案牍，恤流亡，宽赋税，聚糗粮”的清官作为，[56]迫不及待地表现出借古讽今，针砭时弊的心迹所在，不乏寄托喻世兴国的深切含意。李寿卿的这种凭借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直抒胸臆，铺陈“心史”的创作手法在元杂剧中可以说是具有特别强烈的隐喻作用。

狄厚君在《介子推》中描绘出隐居农亩的介子推鼎力辅助晋文公及复国功成而归隐不仕，后被晋文公以“烈火把功臣尽”，[57]烧死在山中的悲剧故事。该剧以强烈批判的思想感情对统治阶级的残酷无情、薄情寡义进行揭露，极力宣扬宁死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出世精神。郑光祖在《王粲登楼》中对主人公飘零客寄，登楼思乡的传说加以虚构，进而展示出当时士人才高命蹇，怀才不遇的悲哀境遇，同时歌颂刚正士人宁可穷困潦倒，也不愿与“鸟兽同群，豺狼同列”的高尚气节。[58]尽管两部剧作中的主人公所服务的帝王君主的前后有别，但均曲折地反映出士人理当誓死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的创作倾向。因此，这两部作品亦可谓是具有传史警世，垂荐后人的特殊意味。

郑光祖所创作的历史剧目约占存目的半数之多，其中包括贤相名臣辅佐君主的故闻佳话。他在《伊尹耕莘》大加歌颂伊尹辅弼成汤，伐桀救民，“一统乾坤万万里”，“抚定苍生失望心”的丰功伟绩。在《周公摄政》中，他再现出周公不恤诽谤，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安邦治国”、讨伐叛逆的忠臣形象。[59]郑光祖着重刻画贤相名臣的积极作用，借以鞭笞祸国殃民的奸邪之臣，反映出当时社会对贤相名臣的衷心祈盼及其对奸邪之臣的深恶痛绝，富于以剧传史，寄托民心的历史作用。

然而，这些杂剧作家身处元朝统治的历史条件下，所创作内容的真实程度不可避免地具有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同时留下牵强附会与任意改造的明显痕迹。就此而论，即使元杂剧大家郑光祖也不例外。在《王粲登楼》的结尾中，郑光祖突发奇想，随意虚构，对于王粲凭着万言长册便能得授“天下兵马大元帅”的高官显衔进行渲染，使人感到荒诞不经，离奇可叹。尽管如此，这些历史剧目无疑可为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风貌与文化阶层的思想感情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 [1] 房祺. 河汾诸老诗集[M]. 卷二, 《秋日出郭》.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6.
- [2] 元好问全集[M]. 上, 卷一, 《学东坡移居八首》.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 [3]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九, 《元好问墓铭》; 苏天爵. 滋溪文稿[M]. 卷二十五, 《三史质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4] 元好问. 遗山先生文集[M]. 卷三十七, 《南冠录引》.
- [5] 陈学霖. 元好问《壬辰杂编》探赜[J]. 晋阳学刊, 1990, (5).
- [6] 王恽. 秋涧先生大全集[M]. 卷四十一, 《帝王镜略序》.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5.
- [7] 金门诏. 补三史艺文志·子部·艺术类[M]. 元代部分, 《辽金元艺文志》.
- [8] 祖颐. 四元玉鉴序[M]. 《四元玉鉴》卷末, 《宛委别藏》.
- [9] 元好问全集[M]. 上, 卷二, 《学东坡移居八首》; 上, 卷十三, 《自题中州诗后五首》; 下, 卷五十, 《徐世隆序》; 元好问. 中州集[M]. 《附录·题中州集后》, 上海: 中华书局, 1959.
- [10] 元好问全集[M]. 下, 卷五十, 《弘治本储罐序》; 下, 卷五十二, 《凌廷堪读元遗山诗》.
- [11] 刘祁. 归潜志序[A]. 归潜志[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2] 子部·小说家类·归潜志[A]. 四库全书总目[M]; 刘祁. 归潜志[M]. 卷十一, 《录大梁事》.
- [13] 金史[M]. 卷一百十五, 《完颜奴申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4] 刘祁. 北使记[M]; 王国维. 古行记四种校录[M]; 王国维遗书[M]. 十三, 上海: 上海古籍书店印行, 1983.
- [15] 程钜夫. 雪楼集[M]. 卷二十一, 《故平阳路提举学校官陈先生墓碑》.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6.
- [16] (清)言如泗修, 吕鼐纂. 解州安邑县志[M]. 康熙二十八年刊本, 卷八, 《人物》.
- [17] 王恽. 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十八, 《浑源刘氏世德碑铭》.
- [18] 元史[M]. 卷一百五十七, 《郝经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9] 元史[M]. 卷一百七十四, 《郝天挺传》.

- [20]陈旅. 安雅堂集[M]. 卷六,《省部政典举要序》.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6.
- [21]赵承禧. 宪台通纪[M]. 元代史料丛刊,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2.
- [22]元史[M]. 卷一百八十五,《吕思诚传》; 卷一百八十六,《张翥传》.
- [23]山右石刻丛编[M]. 卷三十八,《徐毅碑》.
- [24]元史[M]. 卷一百七十,《雷膺传》.
- [25]程钜夫. 雪楼集[M]. 卷八,《太原宋氏先德之碑》; (民国)皇甫振清等修, 李光宇等纂. 续修昔阳县志[M]. 民国三年抄本, 卷三,《儒林》.
- [26]元史[M]. 卷一百七十五,《李孟传》; 卷一百八十三,《王守诚传》.
- [27]王沂. 伊滨集[M]. 卷二十三,《国史院编修官贺君墓碣》.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6.
- [28]山右石刻丛编[M]. 卷三十九,《宋翼碑》; 全金元词[M]. 下, 第八三三页.
- [29]庙学典礼》第 184-212 页,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 [30](清)夏肇庸纂修. 交城县志[M]. 光绪八年刊本, 卷八,《人物》.
- [31]元史[M]. 卷一百八十七,《贾鲁传》; 卷一百八十六,《张翥传》.
- [32]甘水仙源录[M]. 卷八,《洞玄子史公道行录》.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33]元好问全集[M]. 下, 卷五十,《陵川集本遗山先生墓铭》.
- [34]金史[M]. 卷一百二十六,《元好问传》.
- [35]元好问全集[M]. 上, 卷二十,《吏部尚书张公神道碑铭》.
- [36]元好问. 遗山先生文集[M]. 卷十八,《王公神道碑铭》; 卷二十,《顺安县令赵公墓碑》.
- [37]李峭仑等. 试论元好问碑记文章的史学价值[J]. 晋阳学刊, 1990, (5).
- [38]房祺. 河汾诸老诗集[M]. 卷七,《学闲补传》.
- [39](清)白鹤修. 史传远纂辑. 武乡县志[M]. 乾隆五十五年刊本, 卷三,《名宦》.
- [40](清)王家坊. 葛士达总纂. 榆社县志[M]. 光绪七年刊本, 卷六,《文苑》.
- [41]山右石刻丛编[M]. 卷三十六,《傅杰碑》; 卷二十六,《靳和碑》.
- [42]虞集. 道园学古录[M]. 卷三十二,《元朝风雅序》. 上海: 上海书店, 1926.
- [43]元好问全集[M]. 下, 卷三十七,《中州集序》.
- [44]元好问全集[M]. 下, 卷四十六,《续夷坚志一·宋无、王东诸跋》.
- [45]四库全书总目[M].《集部·总集类·中州集》.
- [46]金史[M]. 卷一百二十六,《元好问传》; 苏天爵. 滋溪文稿[M]. 卷二十五,《三史质疑》.
- [47]元好问全集[M]. 下, 卷四十九,《四库全书遗山集提要》.
- [48]《光明日报》(2002 年 5 月 20 日)刊载题为《日本宫内藏宋元珍籍在京出版》的报道中提到《中州集》作为散佚海外的一部宋元珍籍, 从日本引回, 且在北京出版的消息.
- [49]元好问全集[M]. 下, 卷五十二,《赵翼题遗山诗》.
- [50]张正义, 刘达科校注. 河汾诸老诗集[M]. 前言部分.
- [51](明)李侃, 胡谧纂修. 山西通志[M]. 卷十五,《段君墓表》, 成化十一年刊本.
- [52]段辅. 二妙集[M]. 卷八, 上海: 上海书店, 1926.
- [53]邓绍基. 元代文学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57.
- [54]况周颐. 王国维. 蕙风词话·人间词话[M]. 第 221 页.
- [55](明)臧晋叔. 元曲选[M]. 第一册,《梧桐雨》,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359.
- [56](明)臧晋叔. 元曲选[M]. 第二册, 第六四八页,《伍员吹箫》.

[57] 隋树森. 元曲选外编 [M]. 第二册,《介子推》,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405.

[58] (明) 臧晋叔. 元曲选 [M]. 第二册, 第八二〇页,《王粲登楼》.

[59] 隋树森. 元曲选外编 [M]. 第二册, 第五二六页,《伊尹耕莘》; 第四六二页,《周公摄政》.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in Shanxi Region During Mongol-Yuan Period

QU Da-feng

(Institute of Mongol History, 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Abstracts: During Mongol-Yuan Period, some literary men and Confucian scholars, who are from Shanxi Region, had clear and strong consciousness in historiography. As their own duty, they did not forget recording historical facts to pass to later generations and took up different writing ways to do so, whether they wrote books at home or threw themselves into official circles. They recorded historical facts by works, inscriptions, poems or operas. Their historiography not only realizes the purpose that later generations can gather historical facts recorded by them, but also create particular ways that can make later generations draw lessons from the historical facts. Their achievements in historiography have precious value that can be not estimated and play an important-conference role in the history research of Mongol-Yuan Period until today.

Key words: Yuan Period; Shanxi Region; history of the history

收稿日期: 2007-06-20;

基金项目: 内蒙古社会科学规划办 2004 项目《元朝征服与统治下山西地区的各级政权》(0437);

作者简介: 瞿大风(1954-), 男, 汉族, 浙江杭州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元史研究。